

記中國發現的狄奧尼索斯(Dionysos)圖像

■ 謝明良

2015年夏，《中國文物報》上刊載的〈茅坡村考古散記〉一文，披露了一件陝西省長安萬科城隋墓出的陶駱駝。從投稿人也就是主持墓葬發掘清理的田有前先生針對駝所負馱囊圖像的描述，可知馱囊正面三個人物兩側有立柱，中間人物深目高鼻、濃髯，坦裸上身，頭帶頭光，似因醉酒而由左右兩人攙扶蹣跚行進。田氏基於以上圖像特徵，以及立柱頂部呈圓拱形的建築樣式，指出該帶頭光的男子可能就是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os)。¹參照所揭示的彩圖(圖1)，筆者贊成此一頗具慧眼的判斷。

2018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公布的一座早在2006年發掘的隋代夫婦合葬墓(M1)，也出土了類似的紅陶馱囊駝俑。墓位於西安市長安區，墓主張絀開皇七年(587)薨，開皇九年(589)葬，夫人薛世蘭薨於大業元年(605)，大業三年(607)與夫張絀合葬，故同墓伴出的陶俑也可區分為前後二期。出土的陶駱駝計兩件，馱囊上的模印圖紋和前一引長安萬科城墓馱囊圖像相近，都是在拱頂兩側設立柱，柱間有三人，居中蓄髯者帶頭光，左胳膊搭在一旁手執尖嘴胡瓶的男子肩上，右胳膊也在女子雙手扶持下舉步前行。(圖2)報告書也認為，駝雙峰之間，氈帳支架上所搭馱囊的中心人物，應該就是希臘酒神狄奧尼索斯，旁二人為其隨從，並提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亦見同式駝俑。²(圖3)長年致力於東西圖像文物交流的葛承雍教授，既對上述西安地區隋墓出土駝俑馱囊細部圖像做了解說，也總合介紹

了酒神狄奧尼索斯的行頭(頭冠、權杖)、隨侍者，以及常見的酒器種類造型等，並援引以往學界所已指出甘肅靖遠出土鑲金銀盤盤心所見騎獸持杖男子即酒神。³(圖4)

雖然學界對於1980年代甘肅靖遠出土鑲金銀盤的詳細製作地點、⁴精確年代、⁵盤心外周圖像的比定⁶或盤底銘刻文字⁷的判讀見解不一，但對於盤心所見肩扛長杖，倚坐在四足獸上的卷髮青年男子應即酒神狄奧尼索斯一事則頗有共識。也就是說，這件年代約在二至四世紀，製作於羅馬屬地，底刻大夏文，盤心持兩端飾松果即圖爾索斯杖(Thyrsos)的男子應該就是酒神狄奧尼索斯。⁸從古希臘、羅馬的圖像看來，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出場容姿和排場不一而足，從孩童期稚幼的身影到俊美少年，以至表情嚴肅的中年男子和醉酒老翁，其中包括古馬其頓(Macedonia)首都佩拉(Pella)出土的騎豹青年英姿，頭戴常春藤編花冠，手持與靖遠出土鑲金銀盤盤心酒神亦可見到的權杖。⁹



圖1 a. 陶駝 b. 馱囊局部 陝西省長安萬科城隋墓出土 取自田有前,〈茅坡村考古散記〉,7版。



圖2 a. 陶駝 b. 馱囊(線繪圖) 高36.5公分 陝西省西安隋張綝夫婦墓出土 取自《文物》,2018年1期,封面圖;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張全民、李爾吾),〈西安長安隋張綝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2018年1期,頁38,圖15。



圖3 隋代 陶駝 高27.9公分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3630>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2年1月12日。

相對於靖遠鎏金銀盤是由西方攜入中國的舶來品，前引西安隋墓陶駝則是飾酒神圖像的中國製品。其實，中國器物所見希臘酒神圖像以往亦有先例，只是未被正確地識別，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傳河南汲縣出土的隋至初唐期帶鳥頭蓋的青瓷把壺，器身聯珠餅形飾所見被典藏單位視為舞蹈力士的肥胖男子，下額蓄鬚，手持葡萄，足側有傾倒的壺瓶，其表現的正是酒神狄奧尼索斯酩酊之狀。¹⁰（圖5）我們還應留意，前引西安隋張綝夫婦墓駝馱酒神及其隨

侍下方明顯可見希臘人稱為來通（rhyton）的獸首角杯（見圖2）；阿富汗蒂拉丘地（Tilly Tepe）希比爾甘（Sheberghan）第六號墓（西元前一世紀至後一世紀）出土之表現女神尼姬（Nike）祝福酒神與阿里阿德涅（Ariadne）「聖婚」（hieros gamos）母題的金釦具，蓄著濃鬚頭上長角的西勒努斯（Silenus）一手握杖倚地，另一手從獅子足處高舉羊首來通杯。（圖6）狄奧尼索斯的酒具不一而足，如俄羅斯 Perm 地區 Tomyz 出土的粟特帶把銀杯指墊業已由馬爾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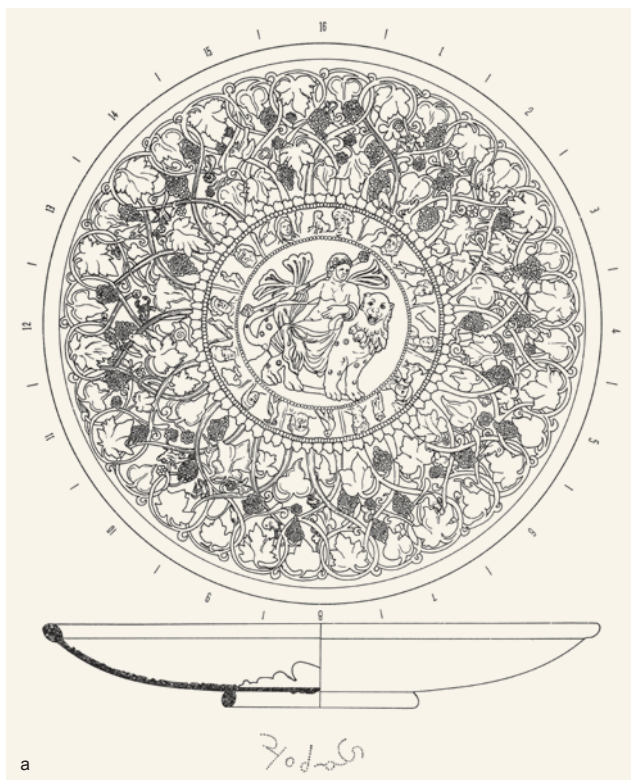


圖4 2~4世紀 a. 鍍金銀鑑(線繪) b. 鑑心局部 口徑31公分 甘肅靖遠縣出土 取自初師實,〈甘肅靖遠新出東羅馬鍍金銀鑑略考〉,頁2,圖1; 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編,《シルクロードの煌めき——中国・美の至宝》,札幌:北海道新聞社,1999,頁105,圖104。



圖5 隋至初唐 a. 青瓷把壺 b. 貼花局部 高41.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圖8。



圖6 西元前1至西元後1世紀 a. 以酒神與阿里阿德涅「聖婚」為母題的金釧具 b. 手舉來通的西勒努斯 局部 6.5×7.0公分 阿富汗蒂拉丘地出土 取自V. I. Sarianidi著，加藤九祚譯，《シルクロードの黄金遺宝》，東京：岩波書店，1988，彩圖21。



圖7 8世紀 把杯指墊所見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os）飲酒圖像 俄羅斯埃爾米塔日博物館（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藏 取自Boris Ilich Marshak著，田邊勝美譯，《ソグドの美術》，收入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15卷・中央アジア》，東京：小學館，1999，頁218，圖157。



圖9 6至7世紀 中亞庫車發現的美杜莎陶頭像 直徑12公分 法國吉美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藏 取自Jacques Giès編，《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第2卷》，東京：講談社，1995，黑白圖版圖136。

克（Boris Ilich Marshak）所指出的酒神圖像是手持舟形杯就口吸飲（圖7）而呈雙把造型的康塔羅斯杯（Kantharos）和來通都是酒神愛用的杯式，這從張繼夫婦墓陶駝馱囊在狄奧尼索斯和隨從足下方可見帶角獸首來通（見圖2），或

土庫曼（Turkmenistan）之帕提亞（Parthia）首都舊尼薩（Nisa）出土的象牙製來通，杯身葡萄唐草下方刻飾著狄奧尼索斯一事亦可窺知來通經常是與酒神搭配的格套器具。

中國做製的來通當中，大英博物館（The



圖8 隋至初唐 a. 白瓷來通 b. 局部 高8.5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Douglas Barrett等編著，《東洋陶磁·第5卷·大英博物館》，東京：講談社，1980，圖14。



圖10 陝西省隋開皇二年（582）李和墓石棺墓上的人面紋 取自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玉清），〈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966年1期，頁37，圖39。

British Museum）藏七世紀隋至初唐期白瓷八方形杯是著名的作品。該白瓷來通除了貼飾獸首和足，杯身各面以聯珠作框，框內模印浮雕人物，人物頭部上方兩側飾聯珠人面（圖8），其整體構圖與伯希和（P. Pelliot）在中亞庫車（Kucha）所發現六至七世紀期蛇髮業已簡化成聯珠的陶製美杜莎（Medusa）頭像有共通之處，不同的是白瓷來通杯身人面呈男子微笑狀，此和庫車

出土張口吐舌的美杜莎像有所區別。（圖9）雖然女妖美杜莎的面容豐富，也存在一類被稱為「美女型」的不吐舌美女頭像，不過白瓷來通杯身聯珠男面顯然更接近陝西省隋開皇二年（582）李和墓石棺蓋（圖10），以及隋代綠釉長頸壺壺身上的聯珠鬚髯人面飾（圖11），不禁讓人狐疑後者所表現的會不會正是酒神狄奧尼索斯的面容？¹¹



圖11 隋代 綠釉長頸壺 高35公分 徐氏藝術館藏 取自徐氏藝術館,《徐氏藝術館:陶瓷篇I·新石器時代至遼代》,香港:徐氏藝術館,1993,圖63。



圖12 前6世紀後半 古希臘陶安弗拉瓶所見酒神面具 高39公分 塔爾奎尼亞 (Tarquinia) 出土 取自朝日新聞東京本社文化企劃局,《エトルリア文明展図録》,東京:朝日新聞社,1990,頁127,圖168。



圖13 a. 三瓣式口帶把注壺所見酒神祭 b. 局部 Antikensammlung Staatliche Museen藏 取自Schlesier, Renate, und Agnes Schwarzmaier, eds. *Dionysos: Verwandlung und Ekstase*. Berlin: Antikensammlung Staatliche Museen; Regensburg: Schnell & Steiner, 2008, p. 12, pl. 1.

以狄奧尼索斯面容做為壺瓶裝飾母題的古希臘陶壺時有所見，如義大利塔克尼亞（Tarquinia）出土西元前六世紀黑像式安弗拉陶壺壺身一面就繪飾了狄奧尼索斯面具。（圖 12）按古希臘雅典的節慶當中有專為慶賀狄奧尼索斯誕生而在萊納翁（Lenaion）神殿懸掛酒神祭祀像，而與此祭儀相應的一群華麗陶壺有時就被分類為「勒納（Lenaia）之壺」，從這類陶壺的繪作內容可以窺知神殿中的祭祀光景，此包括酒神面具（圖 13），或頭戴長春藤花圈、身披長衫的酒神禮拜像以及隨從邁納德斯（Maenads）在酒神偶像前用勺子汲提斯塔姆諾斯（Stamnos）混酒壺中之酒驗證葡萄酒的誕生等光景。¹²（圖 14）有趣的是，1980 年代山東省曲阜、泗水窯址出土一件報告書稱為「蹲獅足硯」的青釉標本（圖 15），但硯牆上部聯珠帶下方的餅

形貼飾與其說是「獅首」，其實更像是有著長卷髮蓄濃鬍髯的人面，傍側做為硯足的則似披著長衫鬍髯男子的頭身像，前者人面不禁讓人想起酒神祭典的面具（見圖 12、13），後者似也和萊納翁神殿懸掛的酒神祭祀像偶合？

前引邁納德斯手持歐依諾可耶（Oinochoe）即尖嘴或口沿呈三瓣式的帶把注壺參與酒神祭典（見圖 13），這類在中國文獻稱為「胡瓶」的帶把壺亦見於張綝夫婦墓和大都會博物館藏隋代駝俑馱囊，所見酒神隨從薩提耳（Satyrs）持物。（見圖 2、3）不僅如此，前述在壺身貼飾酒神醅酏之狀的隋至初唐青瓷帶蓋注壺（見圖 5），去蓋之後的注壺本體也屬同一瓶式。就造型而言，玫茵堂（Meiyintang）舊藏一件相對年代在六世紀的隋代雞頭把壺，雖貼飾了雞頭，但亦可歸入廣義的胡瓶範疇。（圖 16）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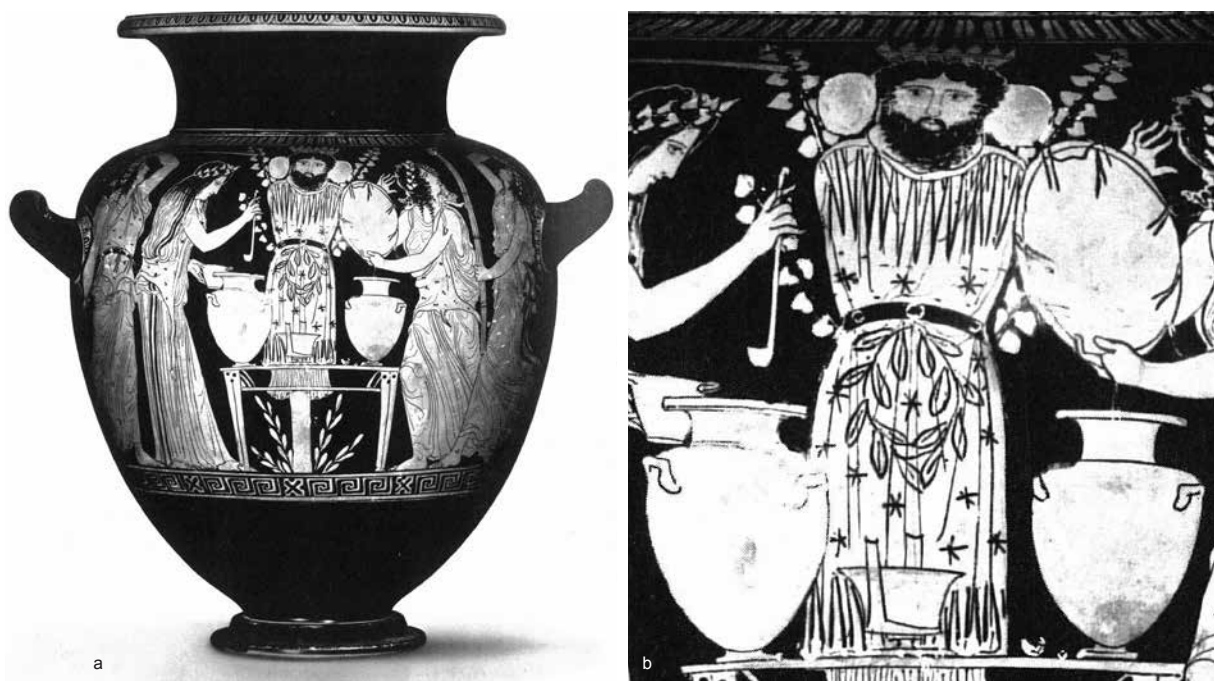


圖14 西元前425~390年 a. 酒神誕生祭典一景 b. 局部 高49公分 拿坡里國立考古學博物館藏 取自Erika Simon著，芳賀京子、藤田俊子譯，《ギリシア陶器》，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21，頁436，圖165-1。



圖15 山東省曲阜泗水窯址出土青釉硯殘件（線繪圖） 取自宋百川、劉鳳君，〈山東曲阜、泗水隋唐瓷窯址調查〉，《考古》，1985年1期，頁39，圖6之3。



圖16 隋代 褐釉雞頭把壺 玫茵堂藏 取自Krahl, Regina. *Chinese Ceramics from Meiyintang Collection*. London: Paragon Writing, 2006, vol. 3, part 1, fig. 1238a.



圖17 西元前4世紀 酒神侍從薩提耳石雕像 高164公分 柏林國家博物館藏 取自Schlesier, Renate, und Agnes Schwarzmaier, eds. *Dionysos: Verwandlung und Ekstase*, p. 114, pl. 8.

壺身滿飾貼花，除了最上層等距貼飾雞首、雙繫耳和把柄之外，整體以餅花為間隔圍飾聯珠男子人面紋，而其造型則又和前引白瓷來通上的聯珠人面（見圖8）大體一致。這樣看來，祖型來自古希臘的歐依諾可耶注酒把壺，以及來通酒杯裝飾聯珠人面恐非偶然，由於其均是注酒、飲酒的器物，不由得再次讓人聯想此一聯

珠人面可能即酒神祭典面具圖像的遺留。義大利 Sabina 發現的前四世紀酒神侍從薩提耳石雕像，右手高舉歐依諾可耶注壺，正在將壺中的葡萄酒注入左手持拿的來通（圖17），也表明帶把注壺及來通杯經常是和酒神狄奧尼索斯塔配的格套道具。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註釋：

1. 田有前，〈茅坡村考古散記〉，《中國文物報》（2015年6月19日），7版。
2.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張全民等），〈西安長安隋張琳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2018年1期，頁26-46。
3. 葛承雍，〈“醉拂林”：希臘酒神在中國——西安隋墓出土駝囊外來神話造型藝術研究〉，《文物》，2018年1期，頁58-69。
4. 關於銀盤的製造地點主要有東羅馬說和大夏說，東羅馬帝國說見：初師實，〈甘肅靖遠新出東羅馬鎏金銀盤略考〉，《文物》，1990年5期，推測其產地約在義大利、希臘和土耳其（頁7）；M. Pirazzoli-t' Serstevens，〈外部世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接觸和同化〉，收入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推測可能出自羅馬東部邊境地區（頁404）。大夏說見：孫機，〈建國以來西方古器物在我國的發現與研究〉，原載《文物》，1999年10期，收入同氏著，《仰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439。
5. 初師實，前引〈甘肅靖遠新出東羅馬鎏金銀盤略考〉，推測其年代在四至五世紀，最晚不過六世紀前半（頁7）；石渡美江，〈甘肅省靖遠出土鎏金銀盤的圖像與年代〉，《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13號（1992），推測其年代在二至三世紀（頁159）；M. Pirazzoli-t' Serstevens，前引〈外部世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接觸和同化〉，推測其年代約在三世紀，最晚不遲過四世紀（頁404）。
6. 初師實，前引〈甘肅靖遠新出東羅馬鎏金銀盤略考〉，頁6-7，主張盤心外周的十二尊像是「宙斯十二神」；石渡美江，前引〈甘肅省靖遠出土鎏金銀盤的圖像與年代〉，頁152-155，反駁初說，認為是酒神狄奧尼索斯的眷屬，筆者同意石渡氏的看法。
7. 除了初師實，前引〈甘肅靖遠新出東羅馬鎏金銀盤略考〉，頁7，所主張的古婆羅謎字母說之外，石渡美江，前引〈甘肅省靖遠出土鎏金銀盤的圖像與年代〉，認為是大夏在貴霜時代迄七世紀仍在使用的希臘文草書體，是刻著 ha(o)roe 的伊朗系人名（頁157-158）；林梅村，〈中國境內出土帶銘文的波斯和中亞銀器〉，《文物》，1997年9期，頁60-61，認為該大夏文刻銘應讀作 Stadēr 400 90，意為「價值490斯塔特」或「價值490金幣」（頁6）。不過，石渡氏之後求教於倫敦大學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訂正銘文應是 narok=naruk，即重1200德拉克馬（Drachma），見同氏，〈索園的圖像〉（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頁103。
8. 初師實，前引〈甘肅靖遠新出東羅馬鎏金銀盤略考〉，頁7；石渡美江，前引〈甘肅省靖遠出土鎏金銀盤的圖像與年代〉，頁155-157。
9. 石渡美江，前引〈索園的圖像〉，頁140-143。
10. 這點已由石渡美江所指出，參見同氏前引〈索園的圖像〉，頁151-152，以及謝明良，〈關於唐代雙龍柄壺〉，收入同氏，《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68-69的引介。
11. 謝明良，前引〈關於唐代雙龍柄壺〉，頁69。另外，關於這類在壺身貼飾聯珠人面紋鉛釉長頸壺年代約在六世紀末期的討論，可參見：龜井明德，〈南北朝期貼花文青瓷的研究〉，《東洋陶磁》，vol. 28（1998-99），頁102-103。
12. Karl Kerényi 著，岡田素之譯，《ディオニューソス—破壊されざる生の根源像—》（東京：白水社，1999），頁297-302。